

十一月的晚上刮起颶風，很不沈常，關了窗戶，聽着風聲、雨聲，窗戶有些震盪，但處境是十分安全的。颶風訊號很小的時候已認得了，常常替它數着一號、三號、五號——不用上學，帶着一份喜悅的心情接待這一意外的假期；漸漸懂事了，憂心代替了兒時的喜悅。木屋會被吹翻的，多少人又無家可歸，或熬着在避風處，但，這只是平等地悲天憫人罷了。今天，顯得不沈常，因為隨着風雨，心底裏湧出一張張面孔，一堆堆泥沙。大坑西的居民怎樣呢？他們已被徙置嗎？徙置後又是怎樣呢……今天，與往時不同了，除了由課本上知道要對窮人有一份同情心外，還添了一份具體的感情——因為會有數天的時間與他們在一起與風雨抗拒。

五月十日的豪雨，使大坑西數度水浸。從報上知道時多少帶來不安，但廿一日的親身探訪才促起行動——那條被埋的六呎闊乘八呎深的溝渠一定要通，否則再下雨時，小西湖村的居民一定被水浸，雖然幾百噸的沙泥不是單單由幾十雙手可以清除，但我們可以發動同學，做成輿論，影響政府，所以挖渠工作是必需的。一來可解決災民燃眉之急，二來可敦促政府加緊工作——以一個參加者與策劃者的身分，頓時泛起大義凜然的感覺。但混濁的溝水，黑黝黝的泥濘，附近豬油廠薰人欲嘔的氣味，笨重的鏟，濕透的衣服，居民的眼光，同學的詢問，激起了一道道的思潮。

「這樣的工作有實效嗎？」每天數十位同學苦着臉，拿着籮，沿着山徑，從大坑西的香島中學出發，步行廿分鐘到達筆架山下的小西湖村。這裏的木屋本來是平安無事的，但近年政府為了擴建啓德機場，在筆架山挖泥，浮鬆的泥土當局並沒有處理，豪雨一來，沙泥就填滿那條六呎乘八呎的深溝，木屋亦被淹了半截。香港地方就是那樣狹小，每天在山徑上走，可以同時看見那積泥的小西湖村，及那崩了一大塊的筆架山，但最諷刺的莫如山上一連串黃色的運泥車，它們還正在工作，密密的排列着與我們成了兩個強烈對比的陣形，幾十把鏟能與這些龐然大物對抗嗎？

兩天後，同學多了，工作本應很順利，但因為鏟與籮不足，情況混亂了，同學洩氣了。但大坑西的榕光里情況可熱鬧呢！民政署發動了三百學生，拿着簇新的鏟、沙包來圍

又是風雨 —

記大坑西

□飛翔□

堵那條被埋的溝渠，攝影機與電影機也來了，喇叭筒更增添了不少熱鬧，報章上也為此用了不少篇幅。災場既無法清理，而輿論也難成為壓力，畢竟宣傳機器並不在我們這一邊！

向外宣傳。向同學宣傳或許會形成壓力。但同學會問：「挖泥可挖去幾百噸泥沙嗎？」「縮在一角工作可催促政府嗎？」每當天天用尺量每日逐寸挖去的泥土，而雨水却又把它一寸寸地帶來時，頹喪了，曾泛起「政府不理會，我們做不了」的論調，但是，我們是不是甘於這些挖泥工作，便宣了不負責任、偽善的政府呢？

當我看見同學放學後，捲起褲腳替人家撥泥渠的時候，我發覺這個不單是我們與政府的問題，而是我們與同胞的感情。我們的認識就往往缺乏這一點。難怪附近居民用奇異的眼光詢問：「香港有這樣的好的學生嗎？」「你們是不是受僱派來的呢？」「你們有能力嗎？」我們之間是如此隔膜，如此缺乏感情，這也難怪，這是社會給我們做成的形象，又是我們給自己建做的壁壘，所以遑論什麼認識社會與改造社會，感情的建立是首要的，挖坑的工作是踏進這一目標的第一步。

其實，香港社會把小市民的地位放得太底了，又把大學生的地位過份提高，把他們分割開來，互不溝通。他們的意見，政府是忽視的，而我們的意見，多少還有些作用。怪不得十日的災情一經學生參與，政府行動便迅速起來。此時又使我想到雞寮，事先不是有居民投訴過嗎？若果不是當局對他們意見的漠視，慘劇可能不會發生；若果學生一向對他們關心，使他們對生活充滿信心，聲音大了，類似的慘劇亦可以減少。若果我們早些發現……所以挖泥的工作實在指出了問題，指出政府的問題，指出學生與居民的感情問題，指出社會間的關係問題。

開始了，是良好的。指出問題才可提供答案。目前學生需要的是共同合作，擴大力量，與居民發生感情，在這個基礎上的行動才有影響。大坑西的挖泥過去了，雞寮的慘劇發生了，六一八的救災工作展開了，這股在風雨中開始的力量還需在風雨中成長！